

聚焦全国两会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

未来五年着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应大会发言人李肇星的邀请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会开始时,温家宝说,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国内外形势也非常复杂,做好各项工作,完成预期目标,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又要树立信心,信心就像太阳一样,充满光明和希望。我的任期还有两年,我深知这两年的工作不比任何一年轻松。“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之。”

人民日报记者:“十二五”规划确定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年均增长7%。我们注意到,这个数字和“十一五”规划相比降低了0.5个百分点。请问总理,我们主动调低经济增长速度这样一个选择是出于什么考虑?如果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会不会影响扩大就业以及改善民生等方面?

温家宝:主动调低“十二五”经济发展速度,不仅表明决心和意志,而且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就是说,在今后五年以至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当长时期,我们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真正使中国的经济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着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经济发展速度、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有密切联系。经济发展速度高,就业人数就多,但通胀的压力也会大。经济发展速度低,就业人数少,通胀压力相对也小,但很容易使经济走向衰退。我们必须在这两者之间走出一条光明道路,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样一个机会,调整经济结构,解决中国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使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环境和资源相适应。7%的发展速度也不算低了。大家注意到,我们的经济总量在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基数大了。真正实现有质量和效益的7%的增长速度,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谈到就业,我觉得我们应该重视结构调整,在结构调整中重视发展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重视发展服务业,包括生产型服务业,这些企业可以容纳更多的就业。我们一定想办法,在比过去低的速度下还能解决中国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问题,这对政府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们完全有信心办好这件事情。

法国《观点周刊》记者:温总理你好。我们看到,今年年初以来,在北非的一些国家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世界也在关注着快速发展的中国,有人称中国为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已经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我想问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如何很好地适应变化中的大环境?其他国家能否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借鉴并得到启示?

温家宝:我们十分关注西非北非发生的政治动荡,但是我们认为,任何把中国同西非北非发生政治动荡的国家相类比都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这是举世公认的。我们的政府在认真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也是老百姓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经济这些年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们一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选择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必须坚持社会公平正义,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第四,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进一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当中,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已是一种模式。同样,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要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我们认为,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都可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和借鉴。

香港有线电视台记者:“十二五”规划报告中特别提到港澳,包括继续支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还有确立粤港多项大型基建项目的合作,中央在作出这些规划的过程中都有哪些考虑?另外,现在有人说香港已经逐渐在消失它的传统优势,已经没有独立的能力应对区域竞争,所以迫使中央这次要出手,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我们很想知道,这些措施是否能够有效解决现在香港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贫富悬殊这样一些深层次矛盾等问题。

温家宝:香港记者的提问,使我想起在2003年我访问香港,也就是在那一年那次访问,我见证了内地与香港签署了CEPA协议。我可以先跟你说,我很想再去一次香港,看望香港人民,向香港人民表示问候。这次“十二五”规划纲要把港澳单独列为一章,表明了中央政府对香港和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支持。这样做不仅是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各界人士的要求,对港澳的长期发展也是有利的。

方寸你说香港的传统优势不存在了,我不这样看。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有着开放自由的经济,有着同国际经济接轨的完备法律法规,有着全面的各类管理人才。香港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都经受了考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没有改变。在规划当中,我们特别强调支持香港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和国际资产管理中心。事实上,这些年我们在金融上的改革都首先在香港先行先试。比如人民币在香港的存款已经超过3000亿元。我们首先实行了货物贸易在香港以人民币结算的试



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这是记者会结束后,温家宝总理走到记者当中,向记者致意。新华社发

点。内地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与香港合作得到加强,与此同时,香港连接内地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很快地向前推进,使物流、人流更加畅通和便捷。这些都有利于巩固和发展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香港目前不仅有应对区域竞争和风险的的能力,也有应对世界竞争和风险的的能力。但是,香港也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外部局势。因此,也要有忧患意识,利用好机遇,迎接各种挑战。我曾经讲过,香港要注意三件事情:第一,要有一个长远的、科学的发展规划;第二,要重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第三,要努力改善民生。我以为,在香港还要重视教育、科技,以增强香港发展的后劲;还要从自身实际出发,重视发展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和旅游服务,发展小型科技创新企业,以增加就业。香港有着比较充裕的财政收入和雄厚的外汇储备,要进一步增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要照顾好弱势群体,致力于改善民生。

我利用这个时间还想回答一个你没有提的问题。就是在“十二五”规划制定过程中,在香港有一种舆论,说香港“被规划”了。我想在这里再次强调,我们将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遵守基本法。中央制定的“十二五”规划都是支持香港的发展,中央的规划绝不会代替香港的自身规划。

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温总理你好。通货膨胀现在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高物价、高房价已经直接影响到老百姓日常生活。那么您如何评价政府已经采取的措施呢?下一步有什么新的措施出台?应对通货膨胀,您会不会考虑让人民币较快升值?

温家宝:通货膨胀就像一只老虎,如果放出来关进去很难。我们目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其实是国际性的,如果我们看整个国际形势,由于某些国家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造成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这不仅影响一个地方,就连欧洲也突破了2%。前几个月,世界粮价就上涨15%,如果再加上西非北非局势的影响,油价高企,超过每桶100美元。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这也是我们难以控制的。另一方面,确实在我们国内也有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各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而造成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我们必须重视解决这些问题。我常讲,通货膨胀包括物价、房价都涉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因此,我们今年在政府各项工作中,把抑制通货膨胀摆在第一位。

关于管好通胀预期,抑制通货膨胀所采取的措施,我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已经详细地讲了。我不想再过多地重复。我只是讲,对于管好通胀预期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去年11月份,我们消费物价涨幅达到5.1%。12月份,经过努力,物价水平降到4.6%。今年上半年是我们比较困难的时期,大概记者先生也懂得,因为翘尾因素影响大。1月份,CPI达到4.9%;2月份,还保持在4.9%。但你知道,2月份翘尾因素的影响高达3.7个百分点。对于物价,我们不敢掉以轻心。我们是从三个方面来努力管好通胀预期的。首先,要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以保障供给;第二,加强流通,特别是要加强农产品流通这个薄弱环节;第三,主要用经济和法律的手段管好市场。我们将持之以恒地把这项工作做到底。至于房价,我们也是三管齐下。第一,还是要控制货币的流动性。我想补充一点,对于物价这一点也是重要的,也就是说消除房价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第二,运用财政、税收和金融手段来调节市场需求;第三,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无论是物价和房价,地方都要切实负起责任来。也就是说要坚持“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房价也由地方来负主要责任。

你关心人民币升值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将继续坚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不动摇。如果从1994年算起,大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已经进行了3次。现在同1994年相比,人民币的实际有效升值升值57.9%。我们的改革主要是改变单一的盯住美元。我们将根据弹性需求的变化来进一步加大对人民币浮动性的弹性。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这种改革还是渐进的,因为它关系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和就业,我们要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总理,您好。刚

才那位外国同行也提到中国的房价,您也阐述了我们的调控房价的三方面政策措施。其实从去年开始,国务院就出台了关于调控房地产的政策措施,被称为历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今年您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重申,要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现在社会上有所担心,就是这些政策措施能不能落实到位?会不会半途而废?请问总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温家宝:关于房价的调控,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对于中央来讲,就是要加强对地方落实房价调控政策的检查力度,真正实行问责制。同时,密切跟踪和分析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形势,进一步研究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对地方来讲,就是要认真落实房地产调控的责任。比如,首先要公布政府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和房价控制目标。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出,我们二管齐下,其实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措施,那就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也就是说从供求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今年再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1000万套,明年再建1000万套,在今后五年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除了棚户区改造以外,主要是公租房和廉租房,这个方向必须明确。这里就有一个资金落实的问题,中央今年将向地方补助1030亿元,地方财政也相应加大投入,但还必须更广泛地利用社会资金。对于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必须单列,做到应保尽保。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现在就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那就是保障性住房的设计,建设必须有高标准、高要求,也就是说要确保质量、安全和环保。特别是在环保上,从设计到建设整个过程,都要实行节能。我在这里想强调一点,就是对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后,管理和退出机制现在就要着手制定规则,形成一个完整的从建设到管理、退出的机制,使保障性住房质量和效益得到保证,使保障性住房将来的管理也得到保证。

韩国文化广播公司记者:我们非常关心“十二五”规划中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容。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请问中国将如何发挥这种优势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在文化领域有什么具体政策和方向?

温家宝: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国民素质、文化发展和道德情操上。我们国家有着5000多年的文化传统。在世界上,历经劫难而至今仍保存完整传承下来的文明古国,中国是一个典范。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化传统更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我们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只有这样,才能使祖国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就是我常说的,只有开放包容,才能使国家强大。

在“十二五”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都要把文化的改革和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加强文化建设,改革文化体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文化队伍,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使中国文化有一个大发展和大繁荣。

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记者:“十二五”规划已经正式通过,而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日前在台湾举行了首次会议。请问温总理,“十二五”规划和两岸签署的ECFA怎么促进两岸的经贸合作?另外,有部分台湾民众担心大陆经济转型之后可能对在大陆的台资企业造成很严重的冲击,出现经营困难、边缘化,请问总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温家宝:请台湾记者代向台湾同胞问好。大陆与台湾的ECFA协议的早期收获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在今年2月份,两岸有关方面进行了一次评估,总的认为开局良好,进展顺利,效果初显。今年1月份,两岸贸易额增长了30%。你可能知道,去年大陆与台湾的贸易额超过1400亿美元,台湾的顺差达到860亿美元。你方才担心大陆经济转型会使台湾企业边缘化,我想对你讲,大陆已经成为台商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地。现在在大陆的台资企业已经有8万多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台商投资已经占到大陆吸引外资的9%。我想请你消除顾虑,就是我们推进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只会为台资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更有利的商机。我们将对台资企业继续实行国

民待遇。我还想说一句,在ECFA实行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我们还将本着循序渐进的方式进一步推进ECFA的后续谈判。我们是同胞,“骨肉之亲,祈而不殊”。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温总理,您担任总理的职务已有8年,可能将于2013年卸任,您希望为后人留下什么“遗产”?您在多个场合谈到提倡政治改革,考虑到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您认为应实行什么样的改革,以使中国政府更加有效地解决人民的关切、问题和不满?比如说您支持某些领导职位进行直选和差额选举吗?

温家宝:你的第一个问题问得早了一些。我的任期还有两年,我面临的工作还十分繁重。我应该像一个战士一样,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天,做到“忧国不谋身”,恪尽职守。

我认为改革是历史永恒的主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应该协调推进,这是因为,首先,世界上一切事物不是亘古不变的,“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只有不断地改革,党和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第二,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保障。第三,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要消除腐败的土壤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消除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第四,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我们不仅要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逐步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而且还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配置的不公,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做到所有这一切,都必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第五,要给每个人以受教育的机会,充分发挥人的独立思维和创造精神。只有人民有积极性,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民主的真正含义。我们已经在县和不设区的市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直接选举,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在市以上以至中央,我们还实行的是间接选举。我们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当中实行了差额选举。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中央电视台记者:总理您好。我们特别关注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因为在这些年当中我们看到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两个36条去引导和鼓励民营资本不断获得健康发展。对此有很多民营企业是充满期待的。但是我们听到有一些民营企业认为,政府对非公经济的支持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过程当中有很多民间投资还会面临有形或者无形的障碍,似乎“玻璃门”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且在社会上针对“国进民退”的说法也有不少争议。请问总理,您如何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温家宝:我们的方针是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就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们在2005年出台了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去年我们又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投资的36条。应该说,这两个36条“雷声”不小。我们明确地提出,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在政策层面,无论是在财税金融政策,还是在准入政策上,我们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一视同仁,鼓励相互竞争,共同发展。为什么许多非公企业还感到“雨点小”?甚至提出存在所谓“玻璃门”和“弹簧门”的现象,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落实不够。大家如果注意这两个文件,后一个36条其实是对第一个36条的补充,它在政策和准入的细节上都作了许多明确的规定。我们正在着手制定新36条的贯彻细则。我相信,这两个文件将会进一步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

目前不存在所谓“国进民退”的问题,同样也不存在“民进国退”的问题。应该说,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有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国有经济的发展,今天我不想着重去谈,单就你提到的民营经济发展来说。在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当中,民间投资已经占到50%。在工业企业当中,无论从数量、产值、资产总量还是从业人数,都超过了国有企业,这是一个事实。国有经济虽然比重降低,但它依然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我们一定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同发展。

俄通-塔斯社记者:总理您好。我在中国工作已经18年了,我非常喜欢中国,也习惯了

在中国的生活。但是最近发现物价变贵了,请问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俄罗斯媒体的媒体都称赞中国政府采取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措施。他们说这些措施让人觉得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受到的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您是否同意这个看法?

温家宝:你的问题重点在第二问,因此我先回答你的第二问。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如果我们回想2008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当时国际贸易下降26%,而中国的出口要占到GDP的近1/3,波罗的海指数一度快跌到零。我到深圳集装箱厂去考察时,连一个集装箱的订单都没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最低降到3.8%,不少企业停产,大批农民工返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施了包括四个方面内容的一揽子计划。这就是: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和结构性的减税,使企业恢复活力;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使民生继续得到改善;大力度地加强科技支撑,使经济充满后劲;同时大范围地推进重点产业结构调整振兴,特别是发展新兴战略产业。所有这些都是不是单一地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是着眼于长远的发展。

我们实施了4万亿的投资。你问的问题的要害就是所谓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冲击小。我跟你讲,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经过这样的努力,使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回升向好,从而避免经济建设遭受重大的挫折。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至于通货膨胀,我方已经多次讲过,这次通货膨胀是国际范围内的,原因我也已经分析了。我们注意在抑制通货膨胀中,要管好货币。也就是说要控制市场的流动性,从根本上消除通货膨胀的基础。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我想请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问题。您留意到中国的知识界对于“十二五”规划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对于中国的未来指明了更好的方向。但是中国有一句叫作知易行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概念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提到今天,请问温总理,您认为“十二五”规划要得到真正地实施,真正地贯彻落实,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温家宝:你提到转变发展方式知易行难,最难难在什么地方?我以为难在两个方面:一是观念,一是创新机制和干部考核的标准。所谓创新机制,就是要建立和完善鼓励科技进步、人才成长的机制,建立一个国家发展的主要在教育、科技。我一直强调,中国的振兴不单在经济总量,根本在人才和科技进步。我以为有两个数字比GDP更为重要,一是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二是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两条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创新能力,这才是最有力量、最持久、最可靠的创新因素。所谓观念,就是要彻底转变唯GDP的观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需要不断地增加经济总量,但是这种总量的增加不能以过度地消耗资源、能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与它相关的就是干部政绩的考核。我以为对于干部政绩的考核,不仅要考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而且要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平正义和人民生活改善。如果不彻底从根本上解决这两条,我们现在制定的规划也是难以实现的。

新华社记者:总理您好。去年农民收入的增长是27年来首次超过了城镇居民。请问总理,这是否意味着在扭转城乡差距扩大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个拐点?“十二五”时期能否保持住这种变化的趋势?

温家宝:应该说,这些年来农民的收入有大幅度的增长,到去年达到5919元,增长幅度超过10%,也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农民收入的增长大致是三个来源。一是农业生产,或者叫农业收入。我们在2006年全部免除了农业税,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超过1335亿元。与此同时,我们开始对农民实行生产补贴,去年的补贴额超过1200亿元。此外,我们在农村实行了免费的9年义务教育,并且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免除了书本费和住宿费。在中等职业学校,我们还特别规定,对来自农村的孩子和学农专业的一些全部免费。这些都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些重要因素。二是工资性收入。这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取消了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政策。现在农民进城务工的多达2.42亿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到50%。三是部分农民有财产性收入。但是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农业基础还不够巩固,农民收入增长也还不够稳定。农民收入的增长是我们实现社会公平,特别是收入分配公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为此,我们还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比如,我们前几年农产品价格提高了20%-40%,在这个基础上,今年我们继续大幅提升粮食最低收购价。我们正在积极稳妥地实行户籍制度改革,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同时,着力解决农民工生活和工作存在的问题,包括培训、子女上学和社会保障。所有这些都将会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

温家宝:最后,在座的有日本记者吗?我想说几句话。三天以前,日本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地震灾害,给日本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想借此机会,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在这次灾难中遇难的日本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向全体日本人民表示诚挚的慰问。中国也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我们感同身受。在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时候,日本政府派了救援队,并且给中国以物资上的支援。我们的救援队昨天已经到达日本,我们运送的救灾物资也送到了日本。我们将根据日本的需要,愿意继续提供必要的帮助。请你代为转达。